

#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契合度的实证检验

## ——基于深圳四十年经济发展成就

宋晓东 徐 灿

**摘要：**文章基于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年以来经济建设和制度改革的成功实践，运用耦合模型，通过整理历史宏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并分析深圳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契合度。基本结论有：一是深圳全要素生产率（TFP）对 GDP 的贡献率从 1980 年以来实现了两次大规模的提升，近年来贡献了一半以上的比例，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二是深圳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契合度不断提高，尤其是 2015 年后，两者之间进入优质协调关系区间，达成高度统一。针对性提出有关制度创新的几点启示。

**关键词：**生产力；生产关系；耦合协调度；深圳经济

**中图分类号：**G63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2021）02-0102-08

### 一、引言

40 年来，深圳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关键在于不断提升生产力水平，使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走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改革转型的发展道路、融入世界的发展道路和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通过实施持续、大量、多元的制度创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扩大了要素供给数量、改善了要素环境质量、提高了要素产出效率、优化了要素配置结构，不断升级的生产函数提升了深圳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实现了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济奇迹。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指出决定劳动生产力水平的要素包括“工人的平均

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进入 21 世纪，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成长的“突破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科技突飞猛进，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推升生产力高峰海拔。因此，当前以科技进步为核心的生产力水平对全球各国生产关系提出了更高的适应性要求，并且该要求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一视同仁的。

从历史上看，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不协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低配的生产力与高配的生产关系形成巨大反差。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践初期，早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构建了超前的生产关系。这种超前的生产关

系与落后的生产力基础的不适应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发展，导致了生产效率低下甚至出现供给短缺的局面。二是低配的生产关系构成了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的制度桎梏。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具体来看，生产关系要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发展形式，也就是通过社会制度各个系统把生产力的诸要素结合起来。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产物”。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取决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作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他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的结论，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规律判断，反映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也无法容纳其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这种无法包容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同时期表现各异，但本质不变。生产力越是发达，反差越大，无论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还是当前全球疫情下纽约等全球顶级城市应对疫情的表现，都是低配的生产关系与发达生产力不适应而产生的不良反应。

## 二、相关文献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匹配关系理论，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根本核心内容。只有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才具有先进性、合理性。张作云（2020）系统论述了生产关系的结构理论的创建历程，并强调唯物主义世界观、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唯物主义历史观、宽阔的研究视野和革命的批判精神、系统论和整体论的研究方法，是马克思创立这一理论的基本要件和关键点。近年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重新成为热点研究，尤其是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西方经济发展增速放缓，失业率飙升，通胀压力巨大，资本主义国家内生性矛盾进一步凸显。当前，学界普遍认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关联贯穿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但就这两者作用机制还未得到一致结论，甚至存在截然相反的观点。张聚昌（2007）从结构介质的角度，阐述生产力发展会对原有的利益目标和社会规制进行升级，进而塑造新的社会关系。鲁品越（2007）认为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人民的主体意志塑造新的社会关系。郭冠清（2020）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历史考证版为基础，全面梳理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对是否存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进行考证，对“生产力决定论”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郭明飞、陈继伟（2020）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明显的结构性、能性特征，从系统论视角研究发现：生产力是生产要素通过分工形成的非线性系统功能，生产关系是以持续占有生产要素为目的的经济利益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实现机制是以生产要素为中心的生产力循环与生产关系循环的交叉催化过程，在此基础上推动人类社会向更高层级的超循环发展。

综合来看，不同学者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涵努力地进行阐述和解读，但不免陷入学理上同义衍生反复的窠臼。马克思等未能清晰界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涵及外延，导致后续学者在这一理论上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所以，如何系统全面地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内涵进行清晰界定，是研究两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前提。再者，学界缺乏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计量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仅是跃然纸上的纯概念，而是贯穿人类社会各方面能够落到实处的基本元素。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形态，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就是走出一条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道路。深圳是这条道路先行示范的实践者，深圳经济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契合度的不断提升。基于此，本文在清晰界定两者内涵的基础上，测算出深圳市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生产关系评价指数，然后运用耦合模型来对两者之间的契合度进行评价和测算。本文的创新性在于：构建生产关系的模糊评价指标，并进行加权评价量化出生产关系；运用增长核算法测算深圳改革开放40年以来生产力发展状况（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行梳理解；构建一个基于准确量化生产关系的耦合模型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契合度进行实证检验，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深圳市经济发展过程中更高的生产力适配了更高的生产关系的成功实践，并给出

几点政策建议。

### 三、实证模型和数据处理

#### (一) 全要素生产力

基于过往主流文献对于生产率的测算基础, 本文采用生产函数法和指数法计算深圳市全要素生产率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从本质上讲, 与生产率相关的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最终反映到国家地区的经济增长, 衡量的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综合反映。当前主流测算 TFP 的方法分为以 DEA 方法和 Malmquist 指数方法为主的非参数法和以索洛残差法和随机前沿分析法 (SFA) 为主的参数法。目前, 关于深圳市的 TFP 测算文献较少, 孙华好等 (2019) 采用 DEA-Malmquist 指数法测算深圳市及各行业的 TFP 指数并对其进行分解, 认为改革开放以来, 深圳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逐年递增, 其增速有所下降并趋于稳定。本文则采用增长核算法测算, 首先用 CD 法来设定深圳市的生产函数为:

$$Y_t = A_t K_t^\alpha L_t^\beta \quad (1)$$

其中  $Y_t$  反映深圳市的产出水平,  $K_t$  反映其资本积累存量,  $\alpha$  是产出弹性;  $L_t$  反应劳动力水平,  $\beta$  为弹性系数。  $A_t$  是反映生产力的技术因素, 独立于  $K_t$  和  $L_t$  存在。将等式 (1) 两边取对数变形得到以下等式:

$$\ln Y_t = \ln A_t + \alpha \ln K_t + \beta \ln L_t \quad (2)$$

对式 (2) 进行回归运算便能够得出全要素生产率  $A_t$ , 值得注意的是, 它是包含了除要素投入量以外的所有影响产出的因素。如要得到更为精确的计量结果, 则需要另外再细化处理。

资本存量  $K_t$  采用戈德斯密斯开创的永续盘存法。公式表示为:

$$K_t = I_t/P_t + (1 - \delta)K_{t-1} \quad (3)$$

其中,  $I_t$  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P_t$  反应资产的价格,  $\delta$  是折旧率。本文采用剔除通胀后的实际 GDP, 并且所有数据均通过季节调整。

#### (二) 生产关系评价指标

##### 1. 生产关系指标选取

生产关系内涵非常丰富, 为了科学有效反应

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 能够准确衡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契合影响关系, 并依据科学性原则、系统性原则、代表性原则和数据可得性原则选取两个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来进行分析。本文选择利用外资额度、金融深化程度、贸易占比、制度创新数以及研发投入五个指标来构建生产关系指数。

选取利用外资额和贸易占比旨在衡量某个国家地区间对外开放程度。马克思认为, 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 任何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事物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处理好一个国家地区的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 是其取得长足发展的必要条件。对内深化改革, 对外扩大开放, 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历史发展实践中体现颇深, 一般新生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起步阶段经济发展较为落后, 更加需要扩大开放, 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发展经济, 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资本投资。对外开放程度是生产关系的有力体现。

金融深化理论则直接反映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张明辉 (2000) 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与方法分析和评价了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I·麦金农和爱德华·W·肖的“金融压制”与“金融深化”理论, 肯定了该理论的理论价值和对外经济实践的指导意义。金融深化程度越高, 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关系越高阶。选择制度创新数量、研发投入比衡量的是国家和地区创新发展水平。新中国成立初期, 我们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封闭, 制度保守,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严重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推陈出新。本文数据来源为 wind、深圳统计年鉴, 其中制度创新数为笔者利用爬虫 (Python) 程序, 抓取深圳历年颁布政策性文件数表示。

##### 2. 熵权法求权重

熵是信息论中的概念, 表示混乱程度和用来衡量数据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越大熵值越大, 包含的信息就越多, 同样的, 不确定性越小熵值越小。因此熵值可以用来衡量系统的无序性和随机性以及系统内指标的离散程度。通常认为, 一个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 其对整体系统的影响越

大,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项目权重取决于数据本身对系统的离散性。

我们设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两个系统,设变量  $X_{ij}$  ( $i=1, 2, \dots, n; j=1, 2, \dots, m$ ) 为第  $i$  个样本中第  $j$  项指标的值,其中  $n$  为每个系统中的样本数,  $m$  为指标数,对  $X_{ij}$  进行标准化得到  $X'_{ij}$  ( $X'_{ij} \in [0, 1]$ ), 具体公式为:

当  $X_{ij}$  为正向指标时,

$$X'_{ij} = \frac{x_{ij} - \min\{x_j\}}{\max\{x_j\} - \min\{x_j\}} \quad (4)$$

当  $X_{ij}$  为负向指标时,

$$X'_{ij} = \frac{\max\{x_j\} - x_{ij}}{\max\{x_j\} - \min\{x_j\}} \quad (5)$$

其中  $i=1, 2, \dots, n; j=1, 2, \dots, m$ ,  $X'_{ij}$  表示每个项目对整体系统的影响作用。

则第  $i$  个样本、第  $j$  个指标在该指标下的比重

$$P_{ij} = \frac{X'_{ij} + 1}{\sum_{i=1}^n X'_{ij}} \quad (6)$$

其中  $i=1, 2, \dots, n; j=1, 2, \dots, m$ , 第  $j$  项指标的熵为

$$e_j = -\frac{1}{\ln(n)} \sum_{i=1}^n P_{ij} \ln(P_{ij}) \quad (7)$$

其中  $j=1, 2, \dots, m$ , 信息熵冗余度为

$$d_j = 1 - e_j \quad (8)$$

其中  $j=1, 2, \dots, m$ , 则熵权法下各个指标的权重值为

$$W_j = \frac{d_j}{\sum_{j=1}^m d_j} \quad (9)$$

其中  $j=1, 2, \dots, m$

由上述方法处理原始数据得到生产关系的各项目权重系数,具体如表1:

表1 生产关系各指标权重

系统	指标	单位	权重(%)
生产关系	利用外资额	万元	21.382
	金融深化	%	25.274
	贸易占比	%	9.237
	制度创新数	个数	14.323
	研发投入	万元	30.784

### (三)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coupling)最初是一个物理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比如:两个单摆之间连一根弹簧,它们的震动就彼此起伏,相互影响,这种相互作用被称为单摆耦合。类似地,可以把商业空间布局与高质量城镇化两个系统通过各自的耦合元素,包括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要素而产生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现象界定为“商业空间结构——城镇化质量耦合”。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经济发展是基础,人口迁移是表现,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城乡发展差距缩小则是高质量城镇化的最终目标。在电子学领域,耦合是指能量从一个电路部分转移到另一个电路部分的能量传递,也指多个系统或元素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现象。后来,耦合被引入到区域经济领域中,主要有结构耦合、层次耦合、空间耦合和时间耦合等四类。其中,结构耦合是指一定区域内的各子系统之间或者一个子系统内的各要素之间按照一定规则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组合;层次耦合是指微观角度上区域内子系统内的各要素与宏观角度上所在区域系统的耦合关系;空间耦合是指国家或区域之间或内部的区域经济要素形成的有机整体;时间耦合是指某个区域内在时间维度上的协调度变动过程。区域内部元素的相互协同作用是一个整体从无序到有序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系统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区域整体或要素间的协同影响即用耦合度来衡量。我们用深圳10年来的面板数据构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耦合度模型,借此衡量两个系统间的协同程度,具体步骤如下:

#### 1. 计算系统评价系数

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系统中均包含若干影响因素,因此通过将每个系统内的项目进行线性加权平均计算每个系统的综合评价系数,即为:

$$U_i = \sum_{j=1}^n \lambda_{ij} X'_{ij} \quad (10)$$

其中  $i=1, 2$ ,  $U_i$  为第  $i$  个系统的综合评级系数,  $\sum_{j=1}^n \lambda_{ij} = 1$ ,  $\lambda_{ij}$  为每个系统影响因素的权重。

## 2. 计算耦合度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度即为:

$$C = \sqrt{\frac{U_1 + U_2}{(\frac{U_1 + U_2}{2})^2}} \quad (11)$$

其中,  $U_1$  为生产力评价系数,  $U_2$  为生产关系评价系数,  $C$  为两系统耦合度且有  $C \in [0, 1]$ 。当  $C$  值越接近 1 时, 两个系统的耦合度越好, 具体含义如表 2 所示。

表 2 耦合度模型 C 值评价标准

编号	C 值区间	代表状态
1	C=0	两系统中要素无关联, 无序发展
2	0-0.30	低水平耦合
3	0.30-0.50	颀颀状态
4	0.50-0.80	磨合状态
5	0.80-1	高度耦合, 良性发展
6	C=1	良性共振耦合, 有序发展

## 3. 构建耦合协调模型

由于耦合度模型只能衡量系统之间的影响程度, 反映不同系统之间相互作用能力的大小, 不分利弊, 不能反映每个系统的发展水平。因此在计算系统间耦合度后一般会计算两者的耦合协调度。耦合协调度是指相互作用中良性耦合程度的大小, 体现了协调状况好坏, 可以表征各功能之间是在高水平上相互促进还是低水平上相互制约, 既可以反映各系统是否具有较好的水平, 又可以反映系统间的发展水平相对高低情况。

两系统综合评价指数为:

$$T = aU_1 + bU_2 \quad (12)$$

其中,  $a$ 、 $b$  为两系统系数且有  $a+b=1$ , 在这里我们认为两系统不具备从属关系, 量级一致, 令  $a=b=0.5$ 。则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为

$$D = \sqrt{C \times T} \quad (13)$$

耦合协调度  $D$  的区间解释如表 3 所示:

表 3 耦合协调度模型 D 值评价标准

编号	D 值区间	代表状态	所属区间
1	0.90-1.00	优质协调	可接受区间
2	0.80-0.89	良好协调	
3	0.70-0.79	中等协调	
4	0.60-0.69	初级协调	过渡区间
5	0.50-0.59	勉强协调	
6	0.40-0.49	濒临失调	不可接受区间
7	0.30-0.39	轻度失调	
8	0.20-0.29	中度失调	
9	0.10-0.19	严重失调	
10	0-0.10	极度失调	

## 四、实证分析

### (一) 深圳 TFP 测算和分析

测算 1980 年至 2019 年深圳 TFP。各变量均通过平稳性检验, 结果如表 4 所示。对公式 (2) 回归分析得, 资本存量  $\alpha$  为 0.682 和劳动投入  $\beta$  为 0.390:

$$\ln GDP = 2.382 + 0.912 \ln K_t + 0.329 \ln L_t \quad (14)$$

$$(5.23^*) (10.12^*) (2.08^{***})$$

从实证结果上反映资本存量对 GDP 的贡献要比劳动投入高三倍多。括号内是参数估计的  $t$  值, 显著度分别为 1%、1% 和 5%, 回归结果中为 0.928。数据为 1980-2019 年, 源于《深圳统计年鉴》和 wind 数据库。

表 4 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变量	T 统计量	1%	5%	10%	P 值
LnGDP	-7.228	-3.668	-2.966	-2.616	0.002
LnK	-20.382	-4.354	-6.458	-2.616	0.000
LnL	-4.247	-5.481	-8.645	-2.616	0.005

下表反应的是 TFP、资本存量以及劳动力的平均增长率和其对 GDP 的贡献大小。由表 5 分析得出: (1) 自 1980 年以来的头五年, 为第六个五年计划的起点。借由强大的政策支持势能和改革力量, 深圳经济发展呈现爆发式增长, 增长率高

达 57.91%；（2）深圳对金融资本的运用效率一直在提速，表现为资本存量增长率一直保持在高速增长的速度，40 年平均增速为 26.1%；（3）深圳保持了对人才的持续吸引，劳动力平均增速为两位数，但值得注意的是，2019 年劳动力增速仅为 5%，值得警醒；（4）深圳 TFP 增速虽然有所波动，但一直保持高速的增长，另外对 GDP 的贡献度从最初的 2.91% 到现在的 51.58%，可以说，TFP 贡献了深圳经济主要增长。

表 5 各变量对 GDP 的贡献率

年份	GDP 增长率 %	资本增长率 %	劳动增长率 %	TFP 增长率 %	资本贡献率 %	劳动贡献率 %	TFP 贡献率 %
1981-1985	57.91	40.21	15.82	7.12	90.21	5.92	2.91
1986-1990	21.45	30.21	25.34	19.21	60.82	9.27	28.93
1991-1995	32.71	25.64	17.21	24.34	55.23	13.37	36.45
1996-2000	17.57	18.24	10.21	18.11	59.21	12.46	28.42
2001-2005	17.21	17.28	8.21	17.23	42.94	12.98	47.12
2006-2010	13.98	16.39	7.92	14.93	41.64	11.36	50.12
2011-2015	10.72	14.32	6.12	11.23	35.23	13.84	39.12
2016-2019	9.34	12.84	6.02	10.37	32.56	15.93	51.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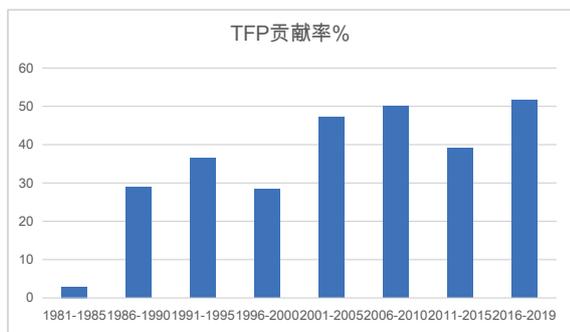


图 1 TFP 对 GDP 的贡献率

由图 1 所示，改革开放初期（1981-1985 年），深圳市经济发展才起步，TFP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随后形成爆发性的增加，1980 年代的第二个 5 年内，贡献率升到近 30%，随后便一直保持这个较高的贡献率。直到 2000 年中国加入世贸

组织，参与全球分工，深圳发挥对外贸易比较优势，TFP 对 GDP 的贡献率又提高了一个台阶（近一半的占比），虽然 2011-2015 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等宏观经济风险拖累所致贡献率有所下滑，但近年来 TFP 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一直在稳定的增长中。

### （二）深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评价指数测算

我们基于表 1 中已得指标权重，依据前述步骤计算深圳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综合评价指数为表 6：

表 6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评价指数

年份	生产力评价指数	生产关系评价指数
2000	0.08123	0.05238
2001	0.08233	0.13233
2002	0.12362	0.10234
2003	0.15232	0.09237
2004	0.18234	0.21483
2005	0.28343	0.19437
2006	0.31398	0.14729
2007	0.36236	0.16234
2008	0.37984	0.24243
2009	0.39357	0.27334
2010	0.41342	0.30543
2011	0.43238	0.31453
2012	0.47234	0.39273
2013	0.53492	0.41343
2014	0.57234	0.44632
2015	0.60234	0.45234
2016	0.62245	0.49234
2017	0.68343	0.51382
2018	0.67342	0.52434
2019	0.68232	0.55234

### （三）深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耦合度

将以上数据代入公式（12）（13），则深圳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系统的耦合度变化及所处解释区间结果为表 7，将表 7 结果转化成图 2。总体而言深圳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耦合协调度在不断升高，从 2000 年之前的协调程度不高到勉强协调再经过轻度、中度良好协调，最后达到优

质协调区间，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制度优势，实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高度契合。值得注意的是，深圳市是从2016年进入优质协调的，这背后彰显制度创新取得卓越社会经济成效。

表7 深圳市2000-2019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耦合度

年份	两系统耦合度	耦合状态
2000	0.5123	勉强协调
2001	0.6237	轻度协调
2002	0.6423	轻度协调
2003	0.6823	轻度协调
2004	0.6834	轻度协调
2005	0.7243	中度协调
2006	0.7798	中度协调
2007	0.7936	中度协调
2008	0.7884	中度协调
2009	0.8357	良好协调
2010	0.8542	良好协调
2011	0.8738	良好协调
2012	0.8734	良好协调
2013	0.8842	良好协调
2014	0.8934	良好协调
2015	0.8992	良好协调
2016	0.9132	优质协调
2017	0.9198	优质协调
2018	0.9233	优质协调
2019	0.9333	优质协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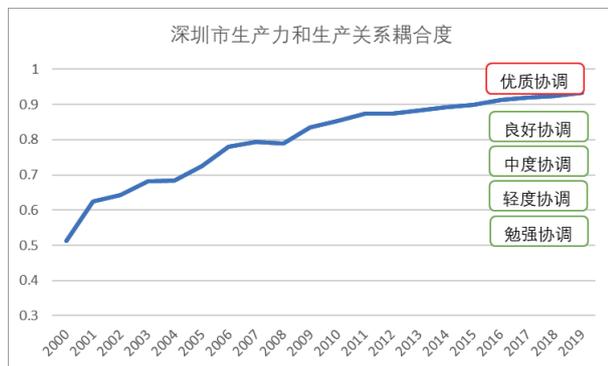


图2 深圳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契合度

## 五、几点启示

### (一) 注重突破要素供给量级的制度创新

要坚持公有制制度基础与要素多元化利用方式相结合，以破解要素供给瓶颈为重点，通过增强要素流动性的制度创新扩大要素供给规模。土地利用一直是深圳发展的核心问题。从早期土地拍卖的“第一槌”和住房商品化制度改革，到2010年代后的集体土地入市和城市多层次住房供应保障制度，都是立足于土地国有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多元化、灵活土地利用的制度创新。这些制度创新激活了沉淀的土地资源，增强土地要素的流动性，提升了空间利用效率，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深圳土地空间不足问题，是解决现实突出问题与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条件相结合的实际路径，这种创新发展路径也体现在深圳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不同层面制度创新为深圳构筑完整的要素供给体系提供了制度保障。

### (二) 注重优化要素供给环境的制度创新

要坚持突出政府专注服务与企业自主经营相结合，以提升要素自由度为重点，通过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的制度创新提升要素配置环境。不断优化提升营商环境，是深圳保持市场经济吸引力、凝聚力和发展活力的关键。从2000年的《关于加快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意见》，到2012年的《深圳市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再到2018年的营商环境改革“20条”，这些制度创新尽管时期不同、侧重不同，但核心都是指向清晰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服务功能，营造一个服务效率最高、管理最规范、市场最具活力、综合成本最低的营商环境，从而让人才、劳动、技术、资金、管理等要素迸发最大活力，使得深圳成为我国市场经济要素自由度最高的城市。

### (三) 注重提升要素供给效率的制度创新

要坚持破除束缚发展的旧体制与打造适应变化的新规则相结合，以规划引导为重点，通过引领产业先行的制度创新提升要素产出效率。深圳产业发展始终能先人一步，准确把握国际产业发展新趋势，关键在于能够充分考虑自身产业的比较优势，充分行使中央赋予深圳先行先试的改革权力，破除旧体制障碍，创建出一套全新的、符合

新兴产业发展趋势的创新制度,促进各类资源向新兴产业集中。1987年深圳市颁布《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被长期体制束缚的科技人员开始以“自主”方式组建民营科技企业,华为公司发展壮大成为世界著名大企业,就是源于这一规定的出台。不断的制度创新将深圳产业比较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2018年深圳获批全国首批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

#### (四) 注重升级要素供给结构的制度创新

要坚持法治化规范与国际化开放相结合,以规则对接为重点,通过推进综合授权的制度创新推动要素结构高级化。以法治化的制度创新对接国际规则,是深圳推动市场经济向高级阶段发展的重要路径。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就是按照法治化框架搭建起来的新型开放试验区,依托《前海蛇口自贸片区条例》、前海“负面清单”等一批极具前海特色的规章制度或规范性文件,形成了“条例+办法+指引”的梯次型规则格局,并以此全面对接国际规则,形成了前海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各类高端要素集聚于前海,铸造了前海以金融为核心、产业结构优化、经济活跃度高的现代产业体系。前海在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跨境金融、事中事后监管、法治建设和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制度创新成果也被全国复制推广。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资本论(法文版)[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3] 习近平的“方法论”[J]. 理论导报. 2017, (7).
- [4] 张作云. 马克思生产关系及其结构理论的创立与当代启迪[J]. 当代经济研究, 2020, (5).
- [5] 张聚昌. 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介质结构[J]. 理论探讨, 2007, (3).
- [6] 鲁品越. 生产关系理论的主体性复归[J]. 教学与研究, 2002, (2).
- [7] 郭冠清. 回到马克思: 对生产力——生产

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再解读[J]. 当代经济研究, 2020, (3).

[8] 郭明飞, 陈继伟.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系统论实现机制[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0, (4).

[9] 孙华好, 吕一清. 深圳市全要素生产率再测算及其驱动因素——基于产业及分行业的研究[J]. 软科学, 2019, (2).

[10] 张明辉. 中国金融深化理论与实证分析[D]. 2000.

[11] 王英伟, 成邦文. 我国研究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定量分析[J]. 科技管理研究, 2005, 25(006).

[12] 高楠, 马耀峰, 李天顺, 白凯. 基于耦合模型旅游产业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以西安市为例[J]. 旅游学刊, 2013, (1).

[13] Bers D M, Despa S. Cardiac excitation-contraction coupling.[M]. Springer New York, 2013.

作者: 宋晓东, 中共深圳市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

徐 灿, 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博士后

责任编辑: 钟晓媚